

内部交流

研究与参考

2014年第八期（总第38期）

《战略再保证与展示决心——21世纪的中美关系》
新书推介会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战略再保证与展示决心 ——21 世纪的中美关系》

新书推介会

2014 年 5 月由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 (James Steinberg) 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麦克·欧汉伦 (Michael E O'Hanlon) 合写的著作《战略再保证与展示决心——21 世纪的中美关系》(*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 S. - 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出版发行。5 月 13 日, 麦克·欧汉伦受邀亲临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举办了一场新书推介会, 欧汉伦围绕新书主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从两国的历史、文化、民族性格等角度展开, 分析了构建未来中美两国战略的新思路, 并就中美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合作提出了大胆设想。

会议由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主持。会上欧汉伦和与会师生展开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现将会议情况整理如下:

吴心伯: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战略再保证与展示决心——21 世纪的中美关系》这本书的作者之一麦克·欧汉伦博士。欧汉伦是布鲁金斯学会“21 世纪安全与情报中心”高级研究员、“外交政策项目”主任, 专注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军

力使用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欧汉伦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讲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同时还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成员。欧汉伦著书无数,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作为特邀评论员出现在电视上或广播节目中。他在中美问题研究上颇具权威,也是一个活跃在公众生活中的知识分子。我很高兴他现在开始更多地关注中美关系。让我们欢迎欧汉伦博士。

欧汉伦: 谢谢。大家晚上好! 很荣幸也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这里与大家对话,介绍我和斯坦伯格合著的这本新书。上周这本书刚刚正式出版发行。首先,我想简要介绍一下书中的一些主要观点,随后我希望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进行充分的互动交流。

斯坦伯格和我在书中阐述的是我们对未来中美战略关系的一个愿景,我们希望两国双方都能采纳我们的建议,共同协作,以求进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假以两三日就能实现的,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不仅对美国如此,对中国亦是如此。毋庸置疑,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也是本世纪最至关重要的一对关系。历史上双方曾有摩擦,不乏挑战,但是我们具有迈向美好未来的潜力。

我们想说的是,最近四十多年来中美关系总体上呈现良好态势,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想当然地以为这种状态会持续下去。这些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已经改变了基本格局,因此我们需要制定新战略。

这并不是基于所谓的“美国衰落论”。斯坦伯格和我都不认为美国在衰落,尽

管我们认识到了中国的崛起,也仰慕中国的发展。事实上,我认为美国仍然在变得更强大,但是中国在这些年的成就确实不容小觑。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有益的,但同时也使得国际战略环境变得更复杂。中国、美国、以及包括巴基斯坦、日本、印度、韩国等在内的其他国家都更有责任制定新战略规划。

过去四十年来的战略,至少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参与”和“对冲”并重,两面下注,显然在当今环境下已不合时宜。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美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在西太平洋独领风骚了。我们需要一个新战略。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事实上,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的崛起。我希望中国人能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一直在鼓励中国发展。诚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这样想,这不能说是美国一贯的态度,但是正是过去四十年来我们在战略上的努力才催生了今天的战略新环境。中国变成了一个让人惊叹的经济体和大国,与此同时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参与”加“对冲”的战略已经过时了,但不无道理。所以我们提出的新概念同样具有双重性:进行战略“再保证”的同时,要“展示决心”。在讨论环节,我们可以具体谈谈两者的区别,但是请先允许我简略谈谈我们的主要想法。

我们在大学里、在国际关系、历史理论研究领域经常听到几大学派。斯坦伯格和我不尽苟同,但我们都知道对未来中美关系有几大论断。自由派,或者说“全球派”、“参与派”的观点是:中国和美国怎么都不可能真的成为敌人,因为中美都太需要对方,战争的后果太严重,树敌完全是无稽之谈。这一派也认为核武器和核威慑是具有强大威力的。此派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和美国在现实中不可能真打起来,这是个愚蠢的想法。

我也赞同打仗是愚蠢的。但是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不少愚蠢的事。就因为这愚蠢并不能证明这不会发生。我的表述可能比较深入浅出。从理论层面分析国际关系,包含各家之言,很多人赞同这一派的理论或类似的观点。但是斯坦伯格和我并不认为这能保证和平。

首先,这一地区不止中美两国,还有其他国家。中国和一些国家存在争端,其中一些是美国的盟友。尽管没人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又一个冷战、军备竞赛,但是因为一件小事、或因为事态升级等意外情况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所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全面战争愚蠢至极就不会发生。比如,后面我会谈谈朝鲜问题,虽然中美双方都不希望发生正面冲突或进行军力竞争,但是这是个敏感地区,问题很可能一触即发。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冲突也不是没可能。斯坦伯格和我都没那么乐观,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在经济上相互依赖性很强、我们有核威慑,就一定有和平。这种设想未免太简单化了。

与此同时,我们并不认为中美应该成为敌人。比如,我们就不赞同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观点,他认为一个既有的大国和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必然是互相竞争的关系,“后起”的大国必然会索要之前没有的东西,很可能就从“先起”的大国那里索取。“先起”的大国会因此而担忧并试图保护自己既有的东西。这是结构现实主义者的论断,我们不敢苟同。

我相信我们两国都有广阔的胸襟和聪明的头脑,不至于此。我们不是生活在过去帝国主义的时代,寸土必抢、凡事必争。中美两国现在遇到的大部分问题都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当然,我们需要寻找新模式来保持合作。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积极应对,我们就能避免米尔斯海默所谓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斯坦伯格和我不赞同任何武断的预测。我们既不认同说“我们一定能相处融洽”的那一派,也不认同说“我们必然不能和睦相处”的那一派。我们认为一切都还没有定局,变数很大。这取决于我们这代人、你们这代人如何处理我们的关系。其实我们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就是在阐述为什么我们认为棋局未定,变数还很大。

我们这本书也不局限给中美两国的读者,我们希望面向更广泛的读者群,包括日本、韩国等等其他国家,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共同讨论更多的议题。

所以我们想说的是一切都还没有定局,最终会怎样取决于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围绕“战略再保证”和“战略展示决心”,我们在书中提出了 20 个对策建议。

在我展开之前,请先让我再讲讲本书前半部分的主旨。我们在书中分不同的章节分别分析了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并另辟一章专门分析了两国的关系。我们两个都是美国人,我们对中国历史、战略文化、战略远景的认识理解可能有偏颇,请你们指正。但请相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客观地进行分析 and 评述。

对每个国家,我们都从历史、政治价值观、战略文化,当代社会现状等多个角度进行剖析。从我们的研究看,中美两国都希望和平,愿意合作,但同时我们两个国家都非常骄傲,固执己见,不愿对对方俯首称臣。所以我们的未来既有可能良性发展,也有可能恶性竞争。

恕我赘言,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两种潜在可能性并存,否则我们就容易陷入前面提到的武断臆测:因为我们有相互贸易,因为我们经济上互相依存,因为我们都拥有核武器,所以我们不可能打仗;亦或是:我们不可避免地一定会成为对手和敌人,因为我们是两个超级大国。事实上,未来怎样,还是取决于两国各自的战略考量和政治文化倾向。

在书中,我们追述了中国历史。作为两个美国作者,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我们认识到中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在一片土地上延绵不断发展的民族。历史上,中国曾经在文化、科技、治理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也曾闭关锁国,与世界隔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美国人应该说句公道话,中国的“闭关锁国”固然是一种消极的治国方略,但是表明了执政者在对外关系上主张和平、避免冲突的态度。这一时期,欧洲列强正忙于对外殖民掠夺、征服世界。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但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很多就是当年的这些欧洲殖民者。所以从历史文化角度看,我们的祖先倒是好战的帝国主义者,而中国人则宁可内向发展。

当然,中国的这种传统也要归因于儒家思想孔孟之道,以及佛教理念的熏陶,因而崇尚以和为贵。诚然,中国把自己视为“处于中心之国”,但这也是因为中国领土之广阔,历史之悠远。中国人不走帝国主义扩张的道路,证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战略思考历来倾向于更趋于合作的态度。

另一方面,不能否认,中国在某些事务上相当一意孤行,甚至不惜使用野蛮粗俗的手段。人类有史以来一贯显露过“野蛮”的本性,中国人也不例外。我并不是说中国人一贯野蛮,但是中国能成为今天这样的大国强国,并不是完全依靠和平的手段。中华文明也不愿意再重蹈覆辙,经历第二个“百年国耻”。我们看到的中国战略思维的背后是一种强烈的不再懦弱的决心。

基辛格在他的书中有过类似评论,很多中国作家也这样阐述过中国的民族心理。我认为中国人下定了决心,并且会尽一切可能不再受欺凌。美国必须认识到,凌驾于中国之上的企图必须摒弃。就因为历史上我们曾经主导西太平洋并不代表

我们一直可以扮演这样的统治角色。这和中国的未来定位相冲突。中国需要战略空间,寻求战略安全,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的对外战略文化。

简而言之,中国是复杂的,中国国内就有不少不同的,甚至相矛盾的观点。中国是一个在儒家文化熏陶下历史上追求和平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靠战争征服大片土地的悠久帝国。20 世纪的屈辱史让中国人不堪回首,中国人有强烈的决心进行自我保护,不再受苦。根据我们的判断,在必要的时候,中国人会站起来,不会屈服。

再来看美国,我们也要客观分析。也许你们并不感到意外,美国人骨子里有这样一种思维,认为我们美国人其实不好管闲事,最好世界不要来管我们,我们也不去管别人。这当然不是真的。但是很多美国人觉得,我们有美丽的山川大地、人口适宜,民族融合,我们呆在北美老家挺好的,最好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要把我们搅进你们的战争(搞得好像没有我们,你们就解决不了问题了)。但是我们在书中的观点是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美国人从来没有这样消极处事过。美国也从来没有闭关锁国。正如中国不是完全依靠和平手段获得辽阔江源,美国也曾诉诸武力。美国并不是通过和美洲土著协商获取土地的,历史上我们曾经打仗抢夺,我们也曾经从欧洲列强那里买土地,我们曾经侵略过墨西哥,也曾经对加拿大剑拔弩张。所以美国从来没有采取过消极战略。

这还只是我们建国后的第一个一百年。我们历史上的第二个一百年,欧洲国家开始对外扩张,有些亚洲国家也开始对外侵略。我们美国人觉得我们必须参与进去,来拯救局面。一战、二战爆发了,不可收拾,我们要加入进去才能平息战乱。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美国人的教训启示是：不管我们主观上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参与国际事务，否则世界就会是一团糟。我们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说，我们宁可束之高阁，不管不问，但是实际上却放不下，因为我们觉得一旦我们放手不管，战争就轮番袭来，世界就会陷入各种麻烦中。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两面下注”。有一个或两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时，国际体系更趋于稳定，但是有五六个或更多实力相当的大国时，就容易发生战争。一战就是这么来的。没人希望这种情况再发生。冷战的两极模式或许比一战前各国烟硝四起的局面好一些，所以也许未来也可以再有一个两极争霸的实际体系，也许是中国和美国，或是美国和印度等等，都有可能。未来会发生什么还难说，但是我们必须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如果我们不这样，世界就很可能再次陷入战争。

所以，美国的政治基因、政治文化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把自己假想成孤立主义者，不想涉足国际事务；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实际行动上却不是这样。我们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我们与其等战争爆发了再去收拾残局，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运筹帷幄，避免战争爆发。

所以美国不可能止步于西太平洋。这并不是说我们把中国视为希特勒的德国，或斯大林的苏联。但这意味着我们相信美国不管，世界就容易陷入混战。我们还不如从一开始就插手，防止冲突。这个教训在美国人心里仍然非常有影响力。

中国人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是：不要重蹈百年国耻的历史；而美国人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是：不要让一战、二战那样的战争再爆发。理论上，我们应该可以找到实现各自目标的和平途径，但现实中，我们也很可能陷入矛盾冲突。中国对其未来地位的设想表明中国期望在其所在地区成为比以前更具主导地位的大国。还没有

人界定中美如何能同时成为地区主导大国。我希望我们在书中的建议能推动实现这个结果。我想共同强大也是最佳的中美未来方案。但是,这需要我们重新定义“大国”,需要我们重新定义“国际关系”。这也是在本书的结尾我们致力做的。

接下来让我具体谈谈书中的对策建议。我不想逐一解释具体的 20 条建议,但是我想举几个例子。

顺便插一句,我知道很多中国人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当下西太平洋的一些争端负有责任。从 2010 年希拉里对河内的访问之行,到近期奥巴马在这一地区的访问,有舆论担心美国给其盟友“壮了胆”,这些国家本来未必敢跟中国叫板,现在正是在美国的庇护下,它们才敢狐假虎威,叫嚣不断,在一些事务上,比如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等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担心美国在这些问题上推波助澜。斯坦伯格和我部分赞同这种说法。换言之,我们并不觉得责任在美国或美国的盟友,我们认为中国也负有责任。在我们看来,事态的自然发展将会是这些国家相互竞争,增加矛盾,除非我们能找到共同采纳的新战略。越南人、菲律宾人、日本人可能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某些问题上固执己见,但中国也同样如此,并不逊色。更何况,中国现在比以前更有实力捍卫自己的主权诉求。

我觉得我是在陈述历史事实,并不是在批评谁,这是事实。历史上一旦某个强国有实力捍卫自己的主张,都会这么做,尤其当它们认为自己的诉求合理合法时,更会这样做。我最近在读海南研究院一个教授写得一本书,书中阐述了中国对南海领土诉求的历史依据。所以我知道按照中国人的思维逻辑,这些确实是中国领土,或者至少一大部分隶属于中国。但是如果你把这种想法和中国的国力结合起

来,再与美国的国力和美国盟友的诉求对比起来看,问题就出现了。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很多,可能性很多。

首先,一种可能是美国就此抽身其中。美国的介入源于历史原因,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等等突发性意外事件。理论上美国宣称自己不愿意涉足国际事务,不愿意诉诸武力。既然中国在崛起,不如就此脱身,让中国去搞吧。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事实上不可能发生。

正如之前提到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美国人的影响很大。美国人坚信我们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对世界更好。美国应该积极应对,而不是等到战争爆发后再去收拾残局。

就算假设我们放弃了这一地区的盟友,就算我们放弃菲律宾、台湾(或许你们觉得我们已经半抛弃台湾了,因为我们背弃了与台湾签订的协议,终止了对台湾的外交认可,但不要忘了,我们也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从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我们台湾的承诺),我们实际上肯定不会这样做。之所以不会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整个全球盟友体系的支柱是美国的可信度。就算从短期效果看,放弃某些盟友对我们有利,从长远来看,绝没有好处。一旦放弃了亚洲的某个盟友,中东、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联酋就会开始担心什么时候美国会抛弃它们。一旦有了这种忧虑,它们就开始研发核武器、甚至挑起争端了。一旦某个国家感到自己的基本安全不能得到保证时,就会变成这样了。

记得一个英国政治家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我觉得这不对。这种观点在一战前盛行,也助涨了一战的硝烟。但是这种愤世嫉俗的思维出发点很卑劣,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朋友,不可取。

在座的有一位是巴基斯坦朋友。巴基斯坦可能觉得美国几次出卖了他们,美国也觉得巴基斯坦曾经几次出卖美国。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更为复杂,但是我相信我们两国都会认同这一点:如果我们过去的关系更平顺一点,如果我们再未来规避这种关系起伏变化,对双方都更好。稳定的国际体系不是建立在背信弃义的基础上的。除非你的理由足够充分,否则你为了一己私利,说翻脸就翻脸,将不会有好结果。

所以我们不能背弃韩国或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我想中国人也没指望我们会这样做。也许你们会希望我们背弃台湾,但除此之外我不认为你们会寄希望于我们背弃其他任何盟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的介入,有助于控制日本的军力野心。在美国的保护下,日本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变得更高调,但同时,我们也将日本的军用开支保持在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1% 以内,我们也防止了日本开发核武器。所以美国的存在,利大于弊。

美国退出或打退堂鼓这种可能性不现实。另一种可能是,正如艾伦·弗里德伯格在《争夺霸权的较量》一书中所说的,鉴于现在的诸多争端,美国应该加大力度参与竞争,因为美国有实力这么做。如果我们加足马力,说不定能赢得这场与中国的战争,重塑我们的霸主地位。我觉得艾伦说的不无道理,我认为美国应该维护自己的实力。但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力量和战略文化不容小觑,美国不可能像过去在冷战中对待苏联那样抗衡西太平洋的中国。换句话说,有些人认为我们可以再搞一次两极争霸,而且我们有可能再赢。但我觉得这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思维。当时,苏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存在根本性的问题,挑战苏联,我们肯定能赢。但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

现在的中美关系中,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中国也是如此。但我们比起 80 年代的苏联都更强大。尽管有些美国人希望中国变得更民主化,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式的共产党体系和苏联模式大不一样。中国的经济固然存在问题,但是却势头强劲。中国实现了历史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未曾取得的成就。

第二种可能,争夺霸权的竞赛也不是任何一方想看到的。我们应该互相尊重。我们两个相当具有实力的大国,如果我们展开全面竞争,争夺霸主地位,那么只会两败俱伤,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是轻易能打败的。

最坏的可能是我们真的打起来。如果我们真的诉诸武力,这一地区将分崩离析,很多资源将被浪费。我们在本可以合作的很多问题上,比如在全球能源革命,全球变暖等议题上我们将不可能协作应对。我们不能犯这种错误,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应该也需要保持自己强大的国力,但是我们不能期望中国接受“老二”的地位。这不现实。

从军事方面看,随着科技发展,中国的武器装备足以让我们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行动更复杂化。这不仅是因为你们的经济增长,还因为科技的发展。这就要求美国接受外部环境变化的事实,我们也需要从更大程度上共同努力在西太平洋寻求力量分配的平衡。

综上所述,美国不可能退出。一旦美国开始背弃盟友,整个世界体系都会垮掉,二战以来的稳定局面就会被打破。

美国也不可能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如果我们打起来,谁会赢呢?谁也说不准。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制造业;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企业家;中国有最大的、最勤奋的工作人口;美国有世界上的最佳盟友;中国 GDP 增长速度无人匹敌;美国的

人均财富量遥遥领先。双方各自都有优势。我们真的想要全面竞争吗？中国确信自己能赢吗？美国一定能赢吗？都不一定。我们应该合理控制我们之间的竞争，避免恶性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战略再保证和展示决心”。

举例来说，我们提出的建议里包括军备控制，也包括双方共同进行自我约束，即使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时，也应当保持克制。我们觉得两国都应该展现维护各自战略利益的决心，这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坏事。当然，“战略展示决心”必须加之“战略再保证”相配合，软硬兼施，所以我们的战略建议具有双重性。这也是本书标题的用意。

可能是一国先单方面做起来，再带动对方也这么做，良性循环，互相克制，共同加强合作互信。另外，我们还在书中谈了军事意外的可能性，如何为各种情况做好预案。

我来分别举几个例子。比如军备控制，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轻松地通过严肃刻板的军备控制条约防止中美军事竞争。有的时候如果太拘泥于形式，我们会发现根本无法起草一份让大家都满意、都能接受的、适用于现实的条约。

我再多说几句，为什么说目前阶段军备控制还有局限性？目前美国在很多领域还保持着军事优越性。如果我们简单地制定一个军备控制条约，规定双方都必须有相同数量的各种武器，这是不现实的。也许到 2050 年有可能做到这样，但是目前条件下，美国的军事地位占主导优势，这也为世界稳定做出了贡献。

也许你们未必赞成我这么说，但是我认为保持这种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也是有益的。至少我们应该让军事力量对比缓慢变化，而不要追求一蹴而就。目前条件下，我们不可能要求中美两国有相同数量的航母。现在我们有大约 20 艘大

航母,还有不少小航母;中国只有一艘。不可能把这个数字拉平,双方各持 10 艘。我们不是盟友,中美关系中毕竟还有竞争的一面。

所以军备控制必须更具体化。不能不切实际地要求绝对的数量对等。我们应该谋求让双方互利的方式。当然,我们也在书中提到,在某些方面,美国应该带头放弃一点儿利益。

比如军事勘察领域。我们知道中国对美国在其领土附近的军事侦察很反感,2001 年的 EP3 撞机事件、南海的几起争端都让中国颇为恼怒。然而,从美方的立场看,我们认为我们是西太平洋的一部分,我们在这一地区有盟友,这牵涉到我们的利益,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你们在做些什么。

卡特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经提出过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案。他说美国应该减少军事勘察。也许因为他没有太多的军方背景经历,他没有给出具体的分析建议。

斯坦伯格和我认为单方面指望美国退让未必现实,我们觉得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入手:让中国多做一些。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让中国突然之间就把军舰开到加州海岸(也许你们真会这样,不是没有可能),但至少短时间内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建议签订一个“开放领空协定”。

“开放领空协定”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早在冷战末期,华约和北约即有类似商定协议,并延续至今。该协定要求参与国之间互相通报过境空军情况,允许信息共享,旨在提高军事活动公开透明性,加强互信。我们希望中美之间也签订一个类似的协定。这是我们的一条建议。

第二,海洋领域的一个建议。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可能不太希望与美国达成在

海军领域的合作条约,因为这样就等同于将美军在这一领域的军事行动合法化了。中国恐怕不希望看到美军在这一地区出没。但是如果参照“开放领空协定”的模式,这不见得是个坏主意。如果我们签订了类似协定,中国将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美国海域进行军事侦察的机会,我们也更有希望安全地合作。

第三个可以合作的领域,是太空领域。如果我们不断地发射火箭,会制造很多太空问题。诚然,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出于军事威慑的目的,但是我们应该限制、减少卫星、火箭等数量,维护太空和平。

我们在书中建议中美两国带领国际社会展开努力,禁止一定高度以上空间内的摩擦碰撞。比如可以规定 500 到 800 英里以外空间内,包括外太空内,控制军用设备的应用,维持和平,以求共同发展。

军用卫星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双方固然都会对对方的军用卫星保持警惕,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努力营造一个合作的环境,拓展合作的空间。

以上是武器控制领域的三个小建议,我想这有助于我们开展军事方面的交流合作。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战略上向对方做出一定的承诺,摆出一定的姿态,让对方放心。这几个措施有助于我们的关系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顺便说一下,“战略再保证”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内涵丰富,不是马上能实现的,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战略再保证”也有别于“战略信任”。

“战略信任”指的是互相信任。虽然在私人层面,我们都有互相信任的朋友,但是在国家层面达到中美互信恐怕还难以实现。毕竟我们在很多领域还存在分歧,很多问题牵涉到美国的盟友以及中美关系。“战略互信”在当前条件下是一个过高的目标,短期内不现实,但是这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目标来努力实现。

比较切实可行的是“战略再保证”，向对方释放友好信号：尽管我们坚决捍卫我们的核心利益，但是我们不会采取挑衅的方式，不会过度处事，并不寻求冲突。

接下来我来谈谈军事现代化以及军费计划。我们给每个国家都提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请允许我先从中国开始。中国的军费每年都在增长，过去几十年是这样，未来还是会继续增长，很快中国的军费支出就要赶上美国的一半。如果我们运用经济学理论进行换算，中国的军费预算大约在每年 1500 亿到 2000 亿美元左右，美国目前在 6000 亿左右。因此可以预计未来十年内中国的国防军用开支将接近或达到美国的一半。

我们在书中建议，当你们的国防预算达到我们的一半时，你们是否可以考虑减缓未来国防预算增长的速度。我们并不是说你们要停止增加国防预算，永远接受低于美国，这未免有些太不实际了。但是我们相信地位差距的变化如果能循序渐进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慢慢改变有助于大家适应这个过程。

我们不能忘记，中美两国的军事力量主要部署在世界的两个区域。我们在亚太有很多盟友和利益，在大中东地区也有很多盟友和利益。中国目前的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西太平洋领域。中国与主要邻国没有很大的领土争端，这是你们取得的成绩。尽管你们与印度等过还存在一些小争端，但总体上你们把问题控制的很好。但是，因为你们主要集中在西太平洋一个区域，我们有西太平洋和中东两个区域，自然美国的国防预算应该是中国的两倍，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该是如此，以后可能还有变化。

我们置身波斯湾主要是保护全球石油，中国也得益于此。我知道也许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内心矛盾，毕竟受庇于美国对石油供应的军事保护让中国显得有些懦

弱。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未来 5 年、10 年我的下一本书中我们可以展望中美两国共同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共同合作保护波斯湾石油。这将是一个可喜的结局,但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所以短期内,随着中国国防开支赶超美国的一半,中国可以考虑适当减缓未来军控开支增长的速度。

我们对美国也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我们提到了“海空战”这个概念,但是斯坦伯格和我并不喜欢这个称呼。我们认为“海空战”有其背后合理的逻辑,随着科技的进步,武器的杀伤性更强,美国空军和海军应该考虑如何协作,信息共享,共同保卫战舰,提高效率。但是“海空战”这个表述存在很多问题,应该进行修改。

首先,这个措辞很糟糕。众所周知,尽管我们坚称“海空战”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不可否认中国的国防预算列世界第二,美国队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发展心存忧虑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中国是美国提出“海空战”的一大动因,也许不是唯一原因,但却是很大一个原因。

然而,我们应该是朋友,我们都希望制定有助于营造良好关系的战略政策,如果美国用这个词显得有些不够有诚意。“海空战”由“陆海战”衍生而来,而“陆海战”是冷战时针对苏联提出的具有敌意和对抗性的战术。现在用“海空战”这个词未免给人带来不好的联想。

用词是很重要的。举例来说,美国先后用了“转向”和“再平衡”两个词来定义其亚太政策。其实两种说法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换了一个词,大家的反应完全不同。我们用“转向”一词,你们听到的是骄傲自大;而我们用“再平衡”一词,至少让人感觉可接受,可以围绕这个话题进行讨论。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喜欢“再平衡”这个说法,但是我没见过一个中国学者喜欢“转向”这个词的。所以用词

准确非常重要。在我看来,美方用“海空战”这个说法未免太咄咄逼人了。

尽管这不是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战略,这个词已经变成一个“热词”,受到很多关注。所以这个概念变得很重要,在五角大楼内是这样,五角大楼外亦是如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进行适当的修改,使之更适应未来。

同时,我们应该让其他更多机构参与进来,除了海军空军外,还有么过海军陆战队、陆军、海岸警卫队,我们的韩国盟友、日本盟友、菲律宾盟友,甚至包括我们的中国朋友。比如我们已经在打击海盗上有过合作。

“海空军事行动”是斯坦伯格和我倾向于用的词,我们觉得这个词比“海空战”好。这个词的含义更丰富,可以包含更多的活动。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军事领域都进行合作,但是有很多领域存在合作的空间,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些机会,加强合作。这个词也没那么咄咄逼人,不会给人以消极联想。

“海空战”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如果中美之间真的开战,美国将不得不先对中国进行攻击,以保证自己的优势,换句话说,也就是“先发制人”。弹道导弹上先发制人,潜艇军舰上先发制人,很容易将事态升级,导致恶性循环。如果美国这么做,很容易让中国担心,使得事态迅速恶化。如果中国把所有的弹道导弹全部瞄准冲绳基地的美国航母,美国同样会很担心。

所以双方都应该努力,展现出有节制的,灵活的,开放的军事姿态。如果我们真的发生摩擦打仗,我们需要运用一定的机制抑制事态恶化升级。所以说,“海空军事行动”听上去不那么挑衅,更温和,避免了“先发制人”给人的消极感受。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方面美国军事教条能有所改变。

最后谈谈朝鲜问题。我们很担心这个潜在问题。我们看看近几年来发生的事

情,都会捏把汗。过去韩国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克制,但是如果类似挑衅事件再发生,很难保证韩国能继续克制。韩国背后有美国的支持,也许会对朝鲜的过激行为作出反应,那么朝鲜下步会做什么呢?有可能会发生战争。金正恩虽然理论上是你们的盟友,但是我相信有时他让你们也觉得紧张。(我并不羡慕你们有这样的盟友。)如果金正恩巩固政权不顺,(他已经做了很多卑鄙的事来巩固政权)那么很有可能导致军方叛变,导致金氏王朝垮台,甚至导致朝鲜国家政权的颠覆。

我想说的是,朝鲜半岛局势可能有几种情况。目前中国军方和美国军方没有围绕这一问题的交流合作。部分原因是中方不太愿意这样,因为如果朝鲜发现中美有类似交流,朝鲜会很生气。美方也有所顾虑,因为如果韩国对此也很敏感,如果韩国发现中美绕过韩国直接交流,韩国也不会高兴。所以我们必须多方通力合作。

斯坦伯格和我建议我们应该创建一个美韩中朝四国对话机制,共同商讨应对朝鲜半岛局势变化的对策。就算不能是官方政府层面的正式外交对话,也应该努力尝试非官方、非正式的其他多种途径。

如果朝韩爆发战争,我想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参与进去,不一定要帮助朝鲜获胜,打赢韩国或美国,而是希望控制局势。毕竟中国担心难民潮涌入,担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跨过鸭绿江扩散到中国境内。中国会希望施加影响,控制局势。

所以我认为解放军可能进入朝鲜,至少建立一个“缓冲带”。目前我们没有任何军事通气合作机制,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希望像上次那样被卷入战争,我们都不想冒这个险。所以我们应该提前做准备,防止这种状况发生。

怎么做呢?我举两个例子。我认为美国和韩国应该向中国求助,换句话说,与

其把问题强压给中国,不如主动邀请中国参与进来,鼓励中国采取行动,共同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

第二,一旦战争结束,很可能韩国将控制整个朝鲜半岛,除非还有一个朝鲜控制的小国留存,但是这种可能性不大。朝鲜半岛多半将得以统一。届时,我们应该让韩国决定谁去谁留下,如果他们希望任何一方留下的话。

如果韩国政府要求美国撤走全部军力离开,美国必须走;如果韩国要求中国走,中国必须走。事实上我想中国也不想留下,你们本来就没有驻守此地。如果美国留下了,美国应该向中国保证我们只保留一小部分军力(比目前更小的军力),并控制在三八线以南。

如果我们现在能坐下来探讨各种可能性,提前做准备,做预案,那么我相信这可以让对方放心。我们可以预估一些问题,并提前采取行动避免冲突。就算没有发生冲突,保持交流有助于我们进行合作,与其成为敌人,不如成为伙伴共同处理这一地区的棘手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多展开,书中还有很多内容,希望大家有机会读一读。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我们可以进行充分讨论。谢谢。

现场提问(选编)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是否能接受中国的崛起?当今的中美关系不同于冷战时的美苏关系。美国是否认识到中国的战略文化是比较务实的,趋于防卫而非进攻,中国并不寻求与美国争霸?

时代不同了,大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圈地占领,各守一方,中美寻求的应该是一个共存的未来,两国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处理国际问题。我们两国都可以成为太平洋两岸的大国。

这需要信息公开,需要有良好的沟通渠道。我认为军事侦察和军事信息的交换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可以通过军备控制审查、卫星系统、非武装军事平台、开放领空等等多种渠道和方式实现信息交换,来促进互信,共同维护和平。

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扮演了有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角色。我认为中国更多地参与阿富汗、非洲事务是好的,有利于地区发展。

美国将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盟友?是否会同等对待所有盟国的问题?担心一旦失去一国信任,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使得盟友体系分崩离析?

这确实是美国的一个顾虑,盟友体系是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如果我们失信于一国,就可能引发他国的担心。但是同时,这并不代表美国对所有问题一视同仁,

同等对待。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应该向盟友发出双重信号,即美国会保护你们,帮助你们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同时,请你们不要率先提起任何冲突,采取过激行为。

比如,我个人并不认为我们可以就钓鱼岛问题给日本开一张空头支票。如果解放军占领了一个争议岛屿,也许很多人认为美国和日本第二天就去攻占或解放该岛,但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不仅危险,也不解决问题。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制定良好的应对措施,防止事态升级恶化,尽可能地采取温和不过激但坚定表明立场的措施应对。

对美国来说,放弃任何一个盟友都是愚蠢的,我们应该营造一个合作的,共同维护和平的国际体系。

如果看待中方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思路? 很多书中的观点似乎与中方的提法很接近,是否同意这种类比?

我很欣赏也赞同中方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你可以说,我们这本书是就如何实现这种新关系提出具体措施的一本实践手册。确实,我们的建议和中方很多提议很接近,有重叠的地方。我想我们可能更侧重具体的军事策略。两国的目标是一致的,我相信如果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如何看待“美国衰落论”?

我认为美国在变得更强大,这并不是横向与其他国家比较,而是纵向地从美国自身的发展的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科技在进步,全球化进程仍在继续,每代人都遇到了新机会。回顾我们抗击贫困、延长人类寿命、创造财富等等的历程,我认为

21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希望的一个世纪。

尽管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问题严重,校园安全、教育问题不少,但是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能源革命,我们很有可能由此成为世界第一的能源供应国。

除此之外,美国有世界一流的高等院校和知名学府,我们对于优秀的企业家传业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美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又有其他国家难以竞争的移民政策,在吸引人才方面很有优势。

美国的人口数量适中,人口增长和地域面积完美匹配,而中国海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过剩压力。相比有些国家人口出现负增长,美国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平稳。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或倾向于民主化的国家,全球政治趋势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应该说,整个国际环境有利于美国。所以我认为美国的未来充满希望,美国可以自信其未来发展趋势只会更好。

新书简介

斯坦伯格与欧汉伦合著的新作《战略再保证与展示决心:21 世纪的中美关系》就未来中美两国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新框架和新建议。他们认为中美双方需要清楚对方的战略意图才有可能避免对抗;美国也要厘清己方的关键利益,对于越过“红线”的行为坚决采取行动。

两位作者认为,中美建交 30 多年来,合作是主流。但近期中美之间的紧张态势在增长,需要“战略再保证”以保护双方的根本利益,维护和平,让存在着天然竞争关系的两个大国向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向发展。

所谓“战略再保证”,指的是中美两国应当注重信任基础和理性对话,互相了解对方的想法,以免造成误判。一是要签署适当的双边协议,比如签订“开放领空协定”等等,更了解彼此的意图,限制造成“威胁”的防卫行为;二是增加彼此之间的透明性,降低误解;三要对于对方善意的行动表示报答与回应,形成互相信任的良性循环。而“战略展示决心”则是清晰地表明自己的“关键利益”和“底线”所在,让对方知道一旦跨越底线要付出惨重代价。具体到现在的东亚地区,就是美国会按照安保条约维护盟友的意义。

斯坦伯格和欧汉伦指出,美国觉得中国想把自己踢出亚太地区,中国觉得美国想遏制中国,双方却都觉得自己“意愿良好”,这就是“战略再保证”没有做到位;他们认为只有将“战略再保证”和“战略展示决心”结合起来,才能防止美国和中国陷

人彼此不信任的境地,而目前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现状正是陷入了这种互不信任的泥沼。

书中两位作者围绕不同议题分别对中国和美国提出了战略政策建议,概述如下:

关于国防预算、军备现代化和军事准则:

- ▶ 中国应该减缓国防预算增幅,将国防预算额控制在美国的一半水平左右。
- ▶ 美国应该将“海空战”调整为“海空行动”;而中国则应该适当限制反舰弹道导弹的研发和部署,并控制应急攻击能力,降低先发制人的风险和使危机升级恶化的可能性。
- ▶ 美国应该限制长程攻击系统的现代化研发和部署,尤其是常规精确攻击(如导弹、炸弹和其他新兴技术)。
- ▶ 中美双方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克制,中国应逐渐撤回部分针对台湾的导弹部署和其他军备;美国对台军售也应作出适当调整,来减弱威胁感。
- ▶ 美国应公开宣布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不旨在威胁中国的核威慑。
- ▶ 中美两国都应在重大的新武器试验前,提前通知对方。

关于应对意外冲突:

- ▶ 就朝鲜的动荡和不稳定局势制定对话机制和概念性的意外应急计划,包括确保朝鲜核武系统和基础设施安全的措施。
- ▶ 如果朝鲜半岛统一,美国和韩国应该划清底线,表明同意撤走三八线以北的美军;作为交换,中国应承诺尊重首尔允许外国军队驻守并协助安保的决定。

▶ 美国应该制定操作层面的战略,来控制台湾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态升级(包括不率先发起对中国本土和港口的攻击;如果中国封锁台湾,应对中国海上交通渠道施加适当压力),同时,应保持对台湾的支持,帮助台湾抵制压迫。

▶ 中国应该致力于仅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而美国应该承诺不支持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

▶ 美国应该针对南海、东海问题,制定不对称的对策来应对中方可能采取的激进行动(包括限制中国航运、经济制裁、加强对盟国的安全保障支持等)。

▶ 中国应该加入“东盟行为准则”,承诺不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减少武装人员在争议海域的军事行动。

▶ 中美两国应该就南海和东海的军事演习和部署提前通知对方。

关于核武器、太空和网络空间:

▶ 中国应该同意限制其核弹头部署,配合美俄下步减少约 50% 核弹头的决议。

▶ 美国应该在导弹国防方面提供更大程度的透明度,并承诺不开发足以遏制中国威慑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 美国应该限制针对中国的长程精确攻击武器的研发和部署(导弹、炸弹和新技术等)。

▶ 中美两国都应该正式批准《全面禁止核武试验条约》,不再研发新弹头,并允许对现有弹头的安全性能改进。

▶ 在太空领域,在一定海拔高度以上两国都应禁止带来太空垃圾的爆炸,禁

止专门的反卫星武器和相关试验,禁止不利于地球生态的轨道武器,并在发射卫星前通知对方。

▶ 在网络空间领域,对明显从两国领土发出的针对民用目标的网络攻击,两国应同意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应该遵守《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的规定,不攻击民用基础设施。

▶ 创建一个网络风险管控中心,一个核风险管控中心,相关的热线,以及其他弹性的改进措施。

关于沟通交流机制和军事勘察:

▶ 两国应该开展“开放领空”相关工作,允许互相观察军事演习。

▶ 运用非武装的方式进行常规监控,同意限制与对方监控飞机或船舰近距离接触的距离。

▶ 创建专门的军事热线和海上意外协定(适用于所有船舰)。

▶ 扩大联合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作者简介

詹姆斯·斯坦伯格是美国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社会学、国际事务和法学教授。他曾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担任副国务卿一职。著有《更为亲近的联盟》(*An Ever Closer Union*)等书。

迈克·欧汉伦是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专注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研究,是美国著名的防务问题专家。著有《战争科学》(*The Science of War*)等书。

此前,两人曾参与合著《保卫美国国土》(*Protecting the American Homeland*)一书。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叶君 整理)